

红色地下电台 串连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1938年9月武汉告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武汉失守后，中共人员分别经宜昌、长沙、桂林等地辗转来到重庆。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渝成立，对外称之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管川、云、贵、鄂、湘、粤、桂、苏、赣、闽等省及港澳地区的中共组织，延安方面的指示通过电波传到这里，又通过这里在广大国统区贯彻。

鉴于机要任务加重，周恩来和李克农两次派人去香港买回大批器材，组装了数十部电台，除在重庆自留8部外，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在天空中架设了一条条看不见的桥梁网络。

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日子里。

□ 据《人民政协报》

A 周恩来临变不惊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网，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南方局的前身叫中共长江局，1937年9月在汉口建立时，只有1部从延安带去的发报机，时刻担心出故障，联络工作脆弱。周恩来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经费虽然很困难，但只要申请购买通讯器材，他都立即批准。这样，由熟悉业务的干部申光通过熟人关系在汉口买到一批通讯器材，又组装了2部，得以维持正常通讯。但从长远考虑，电台还是实在太少。

随着战局的进展，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愈加困难，纷纷要求配备电台，而在汉口靠买零配件组装根本无法满足。于是，周恩来和李克农遂派申光携带数万港币去香港，相机购买无线电器材。

1941年1月11日晚，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周恩来正在参加《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南方局机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标志为“AAA”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发报者为新四军军部。译出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原来这是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新四军在弹尽粮绝时发出的告别电，说明他们已遭不测。

就在当晚，南方局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其中最要紧的是部署二、三线电台，万一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公开电台，后备的即可接替。此后又联系香港秘密电台，指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酝酿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周恩来还提出“隐蔽精干”的策略，将一批陪都文化界进步人士送往香港或外地，同时也疏散了一批党内干部，对留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则进行气节教育。

南方局在重庆设有8部电台，其中3部是公开的，已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另有5部为秘密的，其中2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联络对象为延安、雅安；1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与延安试通后备用。其余2部为流动性质，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联络对象为延安。时局最严峻时，仍有4名报务员在红岩村坚持收发报，片刻不停地向党中央通报重庆的情况。

1943年5月苏共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并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同年9月，国民党军警强行封闭红岩村的公开大电台，说是今后只能通过军政部电台收发报，意在切断红色电波。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办法。从此以后，南方局机要科常常派人将国民党报纸上的新闻、社论用一般密码发往延安，或是每天随心所欲地写上几百字的假电文，盖上领导人的私章，密封后送交国民党军政部、邮政局电台发往延安。延安收到这类电报扔到一边就不管了，只有国民党的“译电专家”还在冥思苦想，企图从中搞出点名堂。真正重要的文件和消息，则由架设在红岩村三楼的5瓦小电台拍发，编码缜密，尽管国民党军统局常年监听，但一次也未能破译。

B 冯乃超巧藏电台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借此机会在武汉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周，并发起献金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募得大批珠宝首饰和现金。郭沫若委托阳翰笙、程步高等人，用这笔资金到香港去购进10多辆卡车、医疗器材和药品运回内地，然后又分送到各战区去。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郭沫若打了“埋伏”——其实还有2卡车物资，已直接驶往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车上还各自夹带着1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原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最急需的也是通讯设备。因而，阳翰笙等人赴港后，也千方百计买到3部电台，除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1部外，另一部交由冯乃超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冯乃超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实则系中共派往该厅的特委书记，迁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员。他藏有发报机，连郭沫若也不知道。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争取合法地位，南

方局设在重庆的公开电台都向国民党当局申报和备过案。公教人员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将会以“汉奸”罪判处重刑。

冯乃超胆大心细，他先是将电台藏在家中，对家人也守口如瓶，故而一直未出事。但这终非长远之计，他为此绞尽脑汁，却没找到稳妥办法。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党“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因日机空袭日甚，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久而久之，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心生一计。

有一天，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声称亲戚病故，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入夜后，他独自潜往乱葬岗，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上面掩饰成坟墓。俟春雨降临，坟头芳草萋萋，别说是特务，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这坟里藏着1部7.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

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搬家，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

C 刘澄清孤胆建台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两人一道结伴上路。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从未发生问题，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即便电台被查获，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香港沦陷，地下电台暂停，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与延安联络。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频率、时间，终于接上关系，每天除收发报外，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过了一段时间，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

1943年夏，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先在红岩村工

作，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除搞金融业务外，还办有一家电料行，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此人思想进步，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他爽快应允，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静。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或仅仅“OK”一声就停机。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再增设一个备用台。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就在考场上，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后来果然如愿，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

D 马歇尔送货上门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恢复1943年被查封的红岩村大电台，但被国民党当局以“党派社团不得私设电台”为由拒绝，仍强调电文可交军政部代为拍发。因此，在重庆谈判期间，各地的电报往来，仅靠1部输出功率为5瓦的小型密台。

1945年12月21日，美国大使馆人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都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去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不料就在专机即将降落时，国民党军警居然要将中共人员赶出机场，只是由于美国人进行干涉才得以制止。

“调停”持续到1946年2月时，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打算签约，周恩来还草签了美方拟订的建议书，使马歇尔喜出望外。这时周恩来提出中共要设公开电台，便于随时向延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马歇尔一口答应。驻华美军司令部随即派出专人，在重庆中

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架设了1部大型军用电台，发射机为BC-610型，功率450瓦；收讯机为SX-28型和BC-312型。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封闭电台斗争取得的胜利，周恩来还亲自请架设电台的美方人员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不断制造摩擦，马歇尔的“调停”一直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将这部大电台带往南京继续使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将电台交还美方。

从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络，以及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